

中国十外交家

主 编 石源华
副主编 戴鞍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石源华(1)
郭嵩焘	杨小川(1)
初染西风——大沽之役——潜修洋务——涉足外交——	
“循理”思想——出使风波——英伦两载——觐国取经	
——郭刘内斗——悲凉晚秋	
李鸿章	戴鞍钢(34)
涉足外交——“外须和戎”——保护华工——对日外交	
——“以夷制夷”——中法议和——马关遇刺——首访欧	
美——辛丑风云——抱憾辞世	
曾纪泽	戴 冕(67)
名门之后——出使英法——风波乍起——迎难而上——	
虎口夺食——中法交涉——寂寞晚年	
黄遵宪	陈 潮(86)
青少年时代——从探索洋务到出使日本——琉球交涉的	
强硬派——“主持朝鲜外交议”——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	
——追随薛福成使英——新加坡护侨——断结五省未结	
教案——参与苏州开埠谈判——在维新变法的激流中	
——壮志难酬的晚年	
陆徵祥	石建国(131)

形影相对父与子——步入外交殿堂的大门——通向红地毯的时刻——圣彼得堡寒冷的春日——第一个剪辮的清廷公使——首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难以释怀的外蒙交涉——抹不去的污点——一波三折的巴黎之行——遁入空门——身受哀荣

颜惠庆..... 陈 雁(186)

基督徒家庭——从留学生到洋进士——初涉外交舞台——出使欧洲——执掌外交——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再度涉足外交——出使苏联——退休生活

顾维钧..... 钱玉莉(233)

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从总统秘书到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一鸣惊人——周旋于军阀纷争之中——置生死于度外——斡旋越南过境运输——协调战时中英关系——参与筹建联合国——勉为其难的“外交”重负——国际法官十年——难圆还乡之梦

王正廷..... 王 践(293)

负笈求学——跻身政坛——载誉和会——督办鲁案——对苏谈判——“关会”首席——“两案”交涉——改订新约——替罪羔羊——驻节华府——多面人生

陈友仁..... 周燕芳(336)

太平军的后裔——特立尼达的中国律师——归国服务——孙中山的挚友——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时代”——莫斯科之行——参与反蒋运动——投身抗日事业——魂系国土

宋子文..... 孙 锐(367)

特殊的家庭与家教——主持革命财政——“蒋介石的钱包”——拒日派领袖——欧美之行——辞职风波——西安救蒋——为抗日救国而奔走——赴美求援——战时外交部长——主持莫斯科会谈——行政院长任内——赴粤

主政——亡命美国

附录：近代中国外交机关历任行政首长小传

..... 陈莉菲 石建国(415)

前 言

石源华

近代中国的外交,与帝国主义的侵华同时起步,与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耻辱紧密联系,同时也与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争取独立自主地位的斗争相伴始终。近代中国的外交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他们的经历和遭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

编者在拙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书的绪言中曾提出:近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轨迹是一个 V 型,在晚清是从上而下的快速运动,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低落,八国联军之役后跌入最低谷;进入民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开始自下而上的缓慢运动,至开罗会议达到最高峰,以后又趋下降。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世界的进步、中国的觉醒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

在晚清,当帝国主义用大炮、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之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尚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除了朝贡关系外,他们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中外关系。外国来访的使节被视为“向化来朝”的“贡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叩九拜礼,甚至为了坚持这种陈腐的礼仪而不惜牺牲外交上的重大权益。就是在鸦片战

争战败后，清王朝的统治者仍然不认《南京条约》为不平等条约，而是荒唐地视为大清皇帝对于英人的特殊“恩赐”。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外交家来自所谓的“封疆大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满脑子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知识教育和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文，在对外事务中愚昧无知，不仅使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吃尽了苦头，丧失了难以计数的权益，而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丑态百出，留下了相当不良的印象。

然而，在他们中间也不乏精明能干者，他们较早地从中国外交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快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也在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有限地演出了若干好戏，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实现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能作出的贡献，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篇章。如民族英雄林则徐演出了“虎门销烟”的悲壮一幕；恭亲王奕訢曾最早上书提请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倡导开展洋务改革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外交的开拓者；郭嵩焘顶着国内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毅然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曾纪泽虎口索食，“待凭口舌巩河山”，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的新疆伊犁；杨儒在与沙俄交涉中，凛然正气，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于俄京；薛福成与英人谈判一年半，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足智多谋，尽忠职守，在多项对外交涉中成绩卓著；即便是李鸿章，世人也是认他为毁誉参半的历史显要人物，一方面，他一生签署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虽未给他本人的外交实践带来福音，却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外交的最重要的策略思想。

需要提出的是，这些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有所建树的外交家，或政治家兼外交家都没有脱离“忠君”的旧套，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

目标依然是维护和巩固行将覆亡的清王朝。他们的行动完全受制于昏庸腐败的清朝皇帝,并为遍布朝野的封建顽固势力所牵制、反对,甚至遭到诽谤、陷害,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即便有一些好的主张,也往往在一片非难声中成为泡影,使他们感到终生遗憾。他们虽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却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林则徐最终被罚逐至新疆伊犁“赎罪”;奕訢执政 30 年曾三次遭废黜,晚年郁郁死去;李鸿章在奉旨签署《辛丑条约》后,在万人唾骂声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年近多病的杨儒曾多次请求清廷派员接任,以便易地治疗,却不被理睬,最终死于客乡;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的晚年都是在惨凉、忧郁、不得志的心态中度过。

进入民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殖民地民族革命高潮的兴起,迫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由进攻转为防守;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得他们的在华势力大遭挫折,中国得以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与列强各国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并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更使得中国得以与列强签约废除不平等条约,被承认为“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在中国国际地位缓慢攀升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第二代外交家应运而生,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他们有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民国期间,中国的外交体制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北京政府首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外交部实行了重大改革,并规定只有受过外交专业训练的人,才能担任外交部重要官员和驻外使领。在整个北京政府时代这项改革得到了坚持,从而使近代中国外交家的总体素质有所提高,并且形成了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其代表人物有陆徵祥、颜惠庆、施肇基、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郭泰祺、陈友仁、王世杰等。除此而外,还有如宋子文这样的著名政治家兼任外交事务。他们一般在海外接受专

门教育，通晓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不少人具有博士学位，并对外交问题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如顾维钧著有《外人在华权利和利益》，王正廷著有《中国近代外交概要》，王世杰著有《立法比较法》和《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等。他们的经历、学衔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得到尊重，便于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抱负。

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在在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去的权利而奋力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闪光的篇章。尽管从总体上说他们所取得的外交实绩并不令后人满意，但他们的奋斗已使他们声名大震，不仅在国内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国际上知名度颇高的外交家。他们在中国外交界历任要职，往往是三朝、四朝元老，如陆徵祥、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都不仅当过驻重要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担任外交部的总长或部长，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一般不介入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争斗，保持某种超然的态度，使得他们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也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当各派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难以平衡之时，他们常常成为能够为各派共同接受的人物，陆徵祥、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都一次或数次短期出任过国务总理，甚至摄行总统职权，这在北京政府时代极为常见。而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由于国民党独裁政治体制的形成，外交决策权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中央政治会议，后期甚至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手之中，

与北京时代相比较,外交家更多的须听命于党国,其个人施展才能、发挥作用的余地已大大缩小。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外交家们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和经办的外交事务并非事事理想,有的是不合时宜的,有的是完全失败的,有的甚至仍然是丧权辱国的,因而遭到了时人和后人的强烈批评。

编者在撰写拙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时深感对于近代外交家群体的研究,包括对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晋升经过、外交思想、功过是非的评价,极为薄弱,在众多已出版的人物传记中很少能读到外交家的传记,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和总结近代外交交涉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政治意义,外交家们富于传奇色彩的政治阅历和外交生涯,也必定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撰了《中国十外交家》。在近代众多的外交家中选择了 10 位立传,希望他们能代表晚清和民国两代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外交家,是否妥当?还留待读者的评说。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编撰了《近代中国外交机关历任行政首长小传》,收录了近代中国曾经担任或代理、署理过外交机关首长的 43 人的小传,作为本书的附录。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期待着近代中国各主要外交家的大传能够早日问世!

《中国十外交家》的编撰得到了各方的大力帮助。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先生悉心指导了本书的选题和编撰组织工作。《中国十外交家》的编撰,参考引用了学术界已有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加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郭 嵩 焘

杨小川

1876 年 12 月 3 日(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一位头顶花翎、留着长辫、胸挂朝珠、年近六旬的清朝大官僚受命率领他的一班人马,从上海启程驶向英国。这位大官僚就是郭嵩焘。他是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虽然,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75 年的 35 年间,那些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仔细算起来也有几个,如林鍼、罗森、斌椿、志刚、容闳、王韬和李圭等,但是他们只能算作是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前奏或序曲,真正的主题歌应该从郭嵩焘开始。

初 染 西 风

1818 年 4 月 11 日(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也写作云仙或筠轩、仁先,晚号玉池老人。因为他的书斋自名为“养知书屋”,所以他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但三代人都没有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最多只得到过贡生(曾祖)、秀才(祖父)的功名。据郭嵩焘回忆,他的父亲、伯父、叔父与朋友“以诗唱

和，或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弃去，不自收拾”，这种文人学士的洒脱飘逸，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青灯寒窗相比，颇有几分与正统不大协调的味道！这也许就是他们不能成名的主要原因吧？郭嵩焘自己也是“少习辞章之学，洎壮治经史，不能专”，似乎正是继承了乃父家风。

青年郭嵩焘，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功名，不久中进士、点探花、授编修，在科举之途上一步一步向上挤。

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开始在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这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他们踔厉风发，“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曾、刘主攻程、朱理学，以封建卫道士自任，步向儒家神殿正堂，而郭则“精研词章”，时时语惊封建庙堂，带有更多的离经叛道的文人反对派的气质。后来曾国藩精当地评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屈（原）贾（生）之流”，“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认为他只能著书立说，不能担任匡扶社稷的“繁剧”工作，大概就是闻到了郭嵩焘身上的异端气味。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这场暴风骤雨，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在野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湖南这方土地，一变历史上长期沉寂，“少人多石”的状态，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郭嵩焘在他写的《湘中竹枝词》中，赞颂这种在他看来是令人感奋的局面：

捶鼓家家起荷戈，大风吹蹙洞庭波。

由来楚境横天下，千里潇湘地几多。^①

道、咸之际的湖南，也确实是“楚境横天下”，在全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占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仍旧以保守、“霸蛮”而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出名；另一方面，又在各方面都出了不少很大胆、很活跃、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敌对的环境、尖锐的冲突中冒尖，以一种异己的精神面目和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使得举国上下都为之侧目。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在这敌对的环境中练就出了与世格格不入的才人，有如寒星将暗黑的冬夜反衬得更加明亮夺目。

湖南这方水土，“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中原和江淮文化向岭南和苗僮地区传播的“蛮荒边缘”。近代洋人从广东入侵，湖南又首当其冲。新旧观念在这里互相冲击，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交锋；新“变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格外尖锐，旧制度固有的顽疾在这里表现得格外分明。对于大事小事都十分认真而又容易走极端的“蛮气”，在这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有人说，湖南的民气“坚如铁桶”，“虽可嫌，实可喜”^①。这里讲的是认真坚忍的性格比浮华易迁的性格易于有成，但也或多或少触及到了湖南地方风气的一大特色。郭嵩焘正是在此新旧思想交锋中离经叛道和出类拔萃的“楚材”中的一个！

与曾、刘订交以后，青年郭嵩焘又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诸人。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与曾、刘是换帖之交，又与曾、左是儿女亲家，关系不是一般。郭氏的聪明才学，也不在曾、左之下。

在曾、左诸人的所谓“中兴”事业中，郭嵩焘曾出过一些重要的主意，郭嵩焘自称“八载旋军解佩刀”，比如劝左宗棠出山佐张亮基幕，劝曾国藩遵旨出办团练，首倡开厘捐筹军饷，建议练水师保交通等，都具有影响全局的作用。

1856年春，郭嵩焘抵达杭州，初读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第一次听到“日不动而地动”的说法，“颇以为疑”。那时候，对于西方人来说，地动说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人来说，地动说无异于痴

^① 黄庆澄：《东游日记》。

人说梦。郭嵩焘并不像一般闭目塞听的儒生，断然否定这种看来荒谬的说法，而是追根问底，向友人详细了解这种说法。

同年3月，郭嵩焘抵达上海。上海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国内最大的对外开放城市，洋人、洋货比较容易见到。这使从内地来的郭嵩焘大开眼界。他在法国洋行看到了风雨表、千里镜（即望远镜）等新式器具，在法国领事馆所见“穷极奢糜，夷房极明爽”，“置诸玩器，精耀夺目”。郭嵩焘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精耀夺目”的西方文明，没有吓得“非礼勿视”，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并逐步形成自己走向世界的胸襟。

郭嵩焘的这种心态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士大夫的心理是格格不入的。饶有趣味的是：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尘封了几千年的大门被英国撞开。今天的中国人也许都毫不怀疑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一个不公正的条约。可是，当时清政府和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却认为，西方国家仍是朝贡国，南京条约只是皇帝给英国的“恩惠”。清政府未曾思考对外政策的改变，从政府到士大夫，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冷漠和麻木对待外来的一切。

可见，物形的封闭可以被炮火打破，而精神的封闭却并不能被轻易打开。一个拥有自己成熟文明传统的民族，在重新接受一种外来的带有强制性的新文明时，是非常困难的。这时的中国士大夫中，依然被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包围着。郭嵩焘能正视西方文明，这在当时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勇气！

1856年3月18日，郭嵩焘参观了英国兵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极其详细地记载了军舰的外形、结构、武器装备，连舰前轮叶的周长为13尺、1分钟转64轮、水箱贮水300余石、蒸汽机的阀门进退这些细节都充分注意到了，并仔细记录下来。郭对洋人的饮食习惯也作了侧面考察，发出“西人举动，务为巧妙”的感叹。对于“夷人所住，靡不清洁”，他也叹为观止。同天，他又参观了外国

人开办的编译局——墨海书馆，在那里，他得到了伟烈亚力所撰的数学书一部、英国教士在香港出版时事月刊《遐迩贯珍》数部。这些书把郭嵩焘的视线进一步引向西方。

第二天，郭嵩焘在街上遇到了法国洋行的几个外国人，他们也认出了这个来参观过的中国人。也许那时愿主动接触“洋鬼子”的人很少吧，这几个洋人很高兴地与郭握手致意。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中却记录之并加评论：“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看来西方的一切都使他极感兴趣，他不时流露出推崇之情。

上海之行，郭嵩焘还接触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曾国藩也读过这本书。但曾认为徐书的记载为英人大张其词，“英夷”怎么会像徐所描绘的那样神乎其神呢？郭的态度却与曾不同，“亦震诧之”。不过，他之所以震诧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一种前所未闻的西方文明。尽管对这个文明还缺乏深刻的了解，但上海之行却为郭嵩焘补充了不少感性认识，西方比中国先进的初步印象已经形成。从此，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就完全为这个“精耀夺目”的西方文明所吸引，向往它，追求它，并力图把它移植到中国本土来。

大 沽 之 役

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而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

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还是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1859年，当僧格林沁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17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

这年6月，僧格林沁领导的大沽之役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一片欢腾。郭嵩焘因参与大沽之役有功，赏花翎，各种溢美之辞扑面而来。此时，郭嵩焘却异常冷静，对这次“不幸”发生的大沽之役颇不以为然。战后他曾致信给曾国藩：“天津之役，人皆分美及鄙人，而独引以为忧”。

早在郭嵩焘24岁时，他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郭嵩焘主张根据力量对比，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争与和平这个重大的问题。这时候，清政府遇到的是空前强大的对手：在政治上以封建专制对资本主义体制，经济上以小农经济结构对大机器生产，军事上以旧式冷兵器对新式热兵器，形势十分严峻。正是基于对以上形势的认识，他对大沽之役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镇压太平军是当务之急，对付洋人则可从长计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天下大势论之，海口用兵与否，终究无定局”。这就形成他以后对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强大的西方各国交往时，只能忍辱负重，力求和局，慎言战事。

郭嵩焘对清廷内不负责任的清流派的主战论深恶痛绝，批评他们“不揣彼之情，不度己之势，持一恢复中原之公义，贸贸然以兵为戏而姑试之。南京以来，盈朝塞野谈战伐者，大率清之流也”^①。他还深挖清流派积习的原因：“宋明史册具在，世人心思耳目为数百年虚骄之议论所夺，不一考求其事实耳”。他指出：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期（1127—1279年），当时南宋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于是，汉代的军事现实主义和唐朝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了保守的主战精神。这个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清流派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

① 《郭嵩焘日记》（一），第417页。

“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挥动笔杆子，而毫无实战知识。

清流派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对 1840 年、1860 年几次战争的愤怒，部分地是出于一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片面地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清流派的爱国是以顽固、愚昧和排外为代价的。他们坚决主张“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嵩焘对于清流派的批评有其合理的成份，但也反映了他对于西方列强力量的过高估计，这些认识对于日后其对外交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潜修洋务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早在 1847 年秋，郭嵩焘中了进士以后到南京一带游览，曾谒见两江总督李星沅，以长诗奉赠，中有“转念疆场警，须崇颇牧褒。岛夷虽弭伏，舶市尚喧嚣”。诗中说的是，鸦片战争已成为过去，东海听不到洋人的枪炮声，中国又恢复了战前的沉寂，社会在无声地腐烂。很多达官贵人早已把城下之盟的惨痛忘到九霄云外，郭嵩焘却时时以“夷务”为忧。虽然他受时代限制，一时不能真正了解“岛夷”，对他们仍然有蔑视之情，但他却从和平的宁静中敏锐地听到了西方商品东来的“喧嚣”之声。在这喧嚣之后，他更隐隐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使他时刻不能忘记。从此，他的视线转向世界，与“夷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在 1863 年 10 月任粤抚之前，郭嵩焘已以懂洋务知名，但他并没有亲自处理过重大的实际问题。广东巡抚与洋人打交道的事很多，他一上任，英、法领事先后登门拜会，他也回拜了法国领事李添嘉及翻译巴世栋。他积极接触洋人，不避“夷夏之防”，与英国领事罗伯逊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从与洋人的交往中，他尽量了解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以期从中寻觅自强之路。他感到西方国力的强盛在于工商业发达，很想在他职权

范围内作些努力。

1866年郭嵩焘草拟了一份奏折“畅论中外交涉事宜”，因为要去职没有上报，但他在寄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建议解除“海禁”，设立市舶司，“专管出海商船，听从商人制造火轮船”，对于商办轮船制造业应与官办企业一视同仁。并曾与罗伯逊商讨，相约“设立船厂，派一广东绅士主之”。他强调商办企业能与洋人争胜分利，而其他洋务派所创官办企业则弊端重重，于国于民都不利。这种重商求实的思想使郭嵩焘在洋务派中独树一帜。

郭嵩焘所办另一重要洋务为开办广州同文馆。1859年郭嵩焘就曾向咸丰帝建议开办学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翻译，推进洋务。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倡办同文馆的人。但这个建议未被立即采纳，直到1862年7月中国第一所同文馆才正式在北京建立。郭氏担任广东巡抚的第二年，创办了广州同文馆，使中国又多了一个与西方交流的窗口。由于他的思想开明和礼贤下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洋务专家，如李善兰、邹伯奇等。郭积极地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李善兰后被调入北京同文馆任算学总教习，在那里执教13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对于搞洋务，郭嵩焘显得非常自负。他认为，中国“办理洋务三十年，全无知晓”，只有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楨“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①。有人曾评价郭嵩焘经营洋务“既精且大”，郭氏答道：“岂唯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动，其距幼丹（沈葆楨）尚远”^②。

涉足外交

就对外交涉而言，郭嵩焘早在出使英伦以前，已经处理过好几

①②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544页。